



不同环境下效果推理、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的关系

——基于阴阳观视角

王 乐, 龙 静

(南京大学 商学院, 南京 210093)

摘要: 创业拼凑在新企业突破资源约束获得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 然而创业拼凑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却没有回答清楚。基于阴阳观的理论视角, 探讨了在不同环境下效果推理、因果推理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差异。通过对328份新创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 (1) 无论环境不确定性是高还是低, 效果推理对创业拼凑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 在高不确定环境下因果推理对创业拼凑具有U型影响, 而在低不确定环境下因果推理对创业拼凑则具有倒U型影响; (3) 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具有积极影响, 而在低不确定环境下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则具有消极影响。研究结论揭示了决策逻辑二元性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差异及边界条件, 为新创企业解决资源束缚问题提供有益指导。

关键词: 效果推理; 因果推理; 创业拼凑; 环境不确定性; 阴阳观

中图分类号: F272.2; F2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41(2019)09-0101-18

0 引 言

创业拼凑通过对手头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为新创企业突破资源约束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解释(Baker et al, 2005; 祝振铎等, 2017)。新创企业小而新的弱性使得其难以从外部获取足够的关键资源, 这种资源不足的窘境阻碍了企业创新的步伐, 可能导致新创企业面临较高的失败风险。新创企业如何在资源匮乏困境中实现生存与成长? 这是资源基础理论强调竞争优势来源于独特资源所无法解释(Barney, 1991), 却又是新创企业面临的一个现实与紧迫问题。创业拼凑主张对既有资源进行创造性整合和利用以解决新问题或开发新机会, 被认为是新创企业解决资源约束并取得成功的有效途径(孙永磊等, 2018)。创业拼凑要求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零碎的或被闲置遗忘的手头

资源, 不再拘泥于资源的固定价值属性, 通过重新配置以充分挖掘资源的全新价值(Senyard et al, 2014), 有助于新创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和更快的市场响应速度抓住机会从而实现创业成长。

尽管创业拼凑已成为关注的热点, 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 对创业拼凑是如何发生的问题没有回答清楚。目前大多数学者关注创业拼凑对企业绩效和创新的重要作用(Senyard et al, 2014; 于晓宇等, 2017), 而忽略对创业拼凑行为的诱发机制进行探究。杨俊等(2015)指出行为组合是决策逻辑的结果, 研究决策过程和规律是探究有效行为的关键, 进而产生学习效应。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是新创企业制定应对不确定性策略时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的决策逻辑(Sarasvathy, 2001; Yu et al, 2018), 用于指导创业的过程或行为。创

收稿日期: 2019-02-2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2080)

第一作者简介: 王乐(1991—), 男, 山东青岛人, 南京大学商学院,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创业管理。

通信作者: 王乐, wangleqd@126.com

业拼凑作为新创企业突破资源约束的具体行为,会受到创业者思维和决策逻辑的影响。通过识别出拼凑行为背后的决策逻辑,厘清两种不同的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差异,有助于回答“创业拼凑是如何发生”的问题,使得我们能够归纳出可以被教授的创业决策过程。(2) 目前关于决策逻辑二元性特征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在影响创业拼凑的过程中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之间具有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揭示。现有研究大多单独检验效果推理或因果推理的影响,而忽略两者间的互动和协同作用。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是决策过程的两种不同逻辑,两者既相互协调实现优势互补(Reymen et al, 2015),又存在一定张力而对企业有限资源进行争夺(March, 1991; Lavie et al, 2010),容易造成资源分配不平衡,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阴阳观主张事物之间的整体性、动态性和辩证性,认为阴阳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进而形成动态的统一体(Fang, 2011),可见新创企业在进行创业拼凑过程中往往会采用这两种不同的决策逻辑。阴阳观认为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两者是相生相克的,这为探究决策逻辑二元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3) 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作用的边界条件缺乏深入探究。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关键资源才能够获得生存并维持长期发展,使得环境不确定性成为新创企业决策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权变因素。环

境不确定性表现在顾客需求、技术更新升级和竞争程度等方面的不可预测(Lueg et al, 2014),不同的环境会影响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作用发挥的有效性。环境不确定性限制了新创企业的行动能力,增加了其面临的风险,这要求企业必须正视外部环境变化,并根据环境状况及时调整战略决策(Richard et al, 2007)。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探究环境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不同决策逻辑与创业拼凑之间的关系。

基于阴阳观和效果推理理论,本文构建不同决策逻辑与外部环境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探究在不同环境下效果推理、因果推理对创业拼凑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 通过实证检验揭示不同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差异,以回答“创业拼凑是如何发生”的问题。(2) 探究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以进一步揭示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3) 分析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以揭示二元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作用的边界条件,有助于深入理解两者的动态平衡关系。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1.1.1 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

效果推理是指创业者从识别现有可用手段出发,考虑在企业可承担的风险或损失范围内投入资源,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形成战略联盟和获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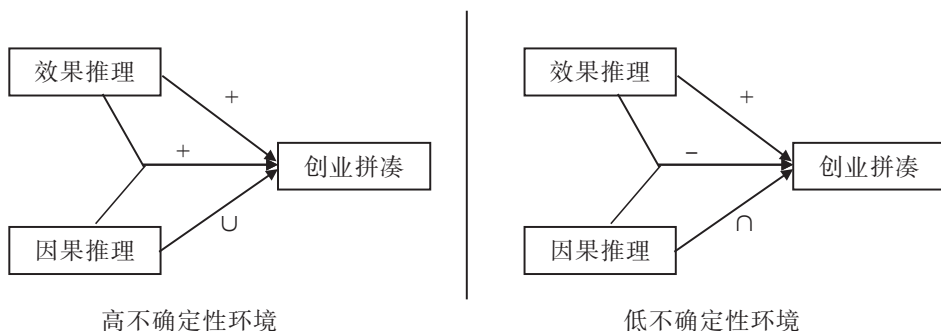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概念框架

前承诺来降低不确定性,并充分利用外部权变因素来创造可能结果的一种思维方式(Sarasvathy, 2001; Perry et al, 2012)。而因果推理是指创业者根据预先设定明确的目标考虑预期回报最大化的策略,通过复杂的竞争分析和精准地市场预测以避免意外事件发生(Reymen et al, 2015; Chandler et al, 2011)。针对传统的预测理性无法有效解释在高不确定和资源束缚情境下如何决策的问题, Saravathy(2001)从决策认知机制出发提出了效果推理理论,用于解释创业老手所采用的一种与传统管理理论不同的理性逻辑,为创业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效果推理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关于不确定环境下如何思考、决策和行动的启发式逻辑,内容包含了认知、思维方式、实践和行为方式等要素(崔连广等, 2017)。Brettel等(2012)开发了效果推理在创新情境下的构念及测量方式,把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各自分为四个相对应的子维度。其中,效果推理包含可承担损失、战略联盟、利用权变和手段导向,因果推理包含预期回报、竞争分析、避免未知和目标导向。

从现有研究看,学者们普遍认同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各自具有不同特性,是两种相互区别的决策逻辑(Perry et al, 2012)。早期研究阶段主要集中于探讨效果推理与因果推理的差异对比、适用领域、维度构成及测量方式,然而对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两者二元性关系的实证研究还较少,且存在着较大的争议。Brettel等(2012)关注两种决策逻辑的差异性,采用二分法进行研究,将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视为一个连续变量的两端,认为两者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 Saravathy(2001)认为尽管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存在差异,但两者是相互独立而非相互排斥的,是在不同情境下同时存在或者相互交织的。Reymen等(2015)指出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具有互补性,有效整合这两种决策逻辑有助于企业实现最优的创业结果。二元性表示着

组织处理两种不同事物的能力,但新创企业资金和经验较为匮乏,两种不同的决策逻辑会相互竞争而造成资源分配失衡,不利于创业拼凑。然而现有研究对组织二元性所强调的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之间“争夺稀缺资源”这一特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因此有必要探讨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新创企业如何协调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之间的资源张力与矛盾。

1.1.2 创业拼凑

创业拼凑是指凑合着组合手头资源以解决新问题或者发现新机会的行为方式(Baker et al, 2005; 刘人怀等, 2017)。Baker和Nelson(2005)通过对29家新创企业的资源利用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开创性地提出创业拼凑的概念,认为在资源约束环境下,创业者通过凑合着利用手头现有资源以应对挑战或实现新的创业机会,是新创企业获得生存与成长的有效途径。创业拼凑要求创业者通过灵活运用自己的经验知识或技巧,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现有资源的价值,并对手头资源进行创造性整合以突破约束困境。创业拼凑包括三个关键要素:手头资源、资源将就 and 组合资源以实现新目标。手头资源,指新创企业已经存在但没有被发掘或被忽视价值的资源。资源将就并不是意味着有明显缺陷的解决方案,而是体现了企业在面对资源约束时会主动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新挑战(Senyard et al, 2009),而不是犹豫不决。组合资源以实现新目标,指创业者根据新的市场机会或挑战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重新组合和利用资源。

创业拼凑强调对手头资源价值和功能进行重新审视的方法被认为是新创企业克服资源约束的有效手段(于晓宇等, 2017),是近年来创业研究中的新兴领域。然而,现有研究对于创业拼凑是如何发生的问题仍存争议,因此不仅有必要关注创业拼凑对新创企业成长的重要作用,还要深入探

究不同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差异。不少学者将创业拼凑当作是组织的一种即兴行为,强调计划和行动是同时进行(Baker et al, 2005; 祝振铎等, 2017),认为拼凑是在毫无准备情况下的自发行为(Hadida et al, 2015)。而Senyard等(2014)认为要重视创业拼凑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有意为之特性,只是将其当作是即兴行为则会限制创业拼凑研究的发展。研究观点之所以不一致,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创业拼凑行为的理性缺乏关注,因为组织应对环境剧变及资源约束的行为往往受到创业者认知的影响。本研究认为创业拼凑并非都是即兴而作,也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是受不同的决策逻辑所驱动。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创业拼凑所蕴含的行为理性,研究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两种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的差异化影响,以回答拼凑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问题。

1.2 研究假设

1.2.1 高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的关系研究

高不确定环境表现为技术频繁的更新,市场变化较快,从而导致新创企业难以获取所需的关键资源和预测市场未来发展趋势。可以看出,高不确定环境对于新创企业来说是一种很不理想的环境。在这种情境下,效果推理强调通过采取现有手段来创造出可能的结果,重视与利益相关者的密切互动,有助于面临高不确定性的新企业在创业行动中进行迭代学习以充分配置资源(Chandler et al, 2011; 郭润萍, 2016)。

一方面,效果推理促使新创企业对现有资源的用途与特性进行准确地分析,能够明确企业的资源需求,有助于提高创业资源的利用效率。高不确定环境使得市场上信息更加不对称,创业资源有效供给不足,导致新创企业难以从外界获取关键资源并把握住机会(彭学兵等, 2017)。在这种情境下,遵循效果推理的新创企业在整合手头资

源的过程中能够加深对现有资源的理解和认识,并识别到资源的潜在价值(Welter et al, 2016),有助于更好利用现有资源解决问题。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新创企业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困境,效果推理能够促使新创企业充分调动被闲置或被忽略的内部资源,将其进行合理配置以发挥手头资源的最大价值。

另一方面,效果推理促使新创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从而可以预先获取资源支持,为创业拼凑创造了条件。在高不确定环境下,市场需求变化多样而难以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遵循效果推理的新创企业不断与外部合作者进行沟通和密切互动,能够及时获得市场需求信息,有助于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和识别新机会。同时,效果推理促使新创企业与外部合作伙伴建立战略联盟关系,有助于降低企业资源获取的难度,能够拓展创业拼凑的范围(Perry et al, 2012)。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不仅有助于新企业获得具有互补性的新知识,还有利于获得其他关键资源,从而促进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利用。综上,在高不确定环境下的新创企业通过采取效果推理往往具备相对充裕的资源基础,能够重新构建具有优势的资源组合以解决问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对创业拼凑具有积极影响。

高不确定环境表现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顾客需求的快速变化,从而导致遵循因果推理的新企业在进行创业拼凑时难以有效地分析竞争对手的行为和把握创新目标。因果推理强调通过市场竞争分析和制定精密的战略计划以实现预期收益最大化(Reymen et al, 2015),体现为基于制定计划的预测型决策逻辑。遵循因果推理的新创企业倾向于全面系统地搜集竞争者信息,并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对市场情况和竞争对手进行分析,认为

通过使用市场竞争分析可以按计划推进创业拼凑的实施。但是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新创企业受到能力、时间和资源有限性的制约(Brettel et al, 2012),中低程度的因果推理对市场竞争状况进行分析的结果不一定准确,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决定,不利于新创企业配置现有资源来解决问题。遵循因果推理的新创企业强调市场竞争分析是很有价值的,这可能会影响企业间的竞争对抗程度和有限资源的分配方向(杜运周等, 2012)。在高不确定环境下,中低程度的因果推理使得新创企业陷入到激烈的竞争对抗困境中,导致无谓的资源损耗,不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为顾客创造价值上,从而降低了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此外,因果推理促使新创企业在进行创业拼凑时以既定目标为决策依据,通过选择最优的资源组合来达到这个既定目标(Sarasvathy, 2001)。然而,新创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和动态,采用因果推理的新创企业在实现预设目标的过程中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市场信息进行搜寻和处理(Sarasvathy et al, 2014),容易造成注意力分散而缺乏专注,从而错过捕捉机会的最佳时机。在高不确定环境下,各要素间的关系变得隐含和模糊,使得新创企业对决策目标判断与理解的难度增大,中低程度的因果推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导致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

随着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新创企业运用因果推理的程度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中高程度的因果推理使得新创企业能够对市场状况和竞争对手进行有效地分析,通过制定精密的战略计划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Chandler et al, 2011; Dutta et al, 2015)。遵循因果推理的新创企业会密切关注竞争者的市场行为,从而会采取有效的战略行动以满足顾客需求,又不会引起竞争者的激烈对抗。在高不确定环境下,中高程度的因果推理促使新企业能在恰当的时机采取适宜的竞争

行动,避免引起企业间竞争对抗的升级,有助于新创企业利用有限资源更好地为顾客创造新价值(杜运周等, 2012)。此外,中高程度的因果推理在以既定目标为依据进行市场信息搜寻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感知到顾客需求的变化,增进对市场需求及价值创造的理解,从而可以更好利用现有资源解决问题。在高不确定环境下,中高程度的因果推理促使新创企业逐渐熟悉外部市场环境,加强企业内部创新知识的积累和转化,通过有效识别新的市场机会,有助于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 在高不确定环境下因果推理对创业拼凑具有U型影响。

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作为两种具有不同特性的决策逻辑,可以被视为一种组织二元(O'Reilly et al, 2013)。虽然两者可以相互协同实现优势的互补,但又存在着对稀缺资源进行竞争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协调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是摆在新创企业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阴阳观主张正反双方是“相生相克”的平衡关系,这为应对本质上是矛盾但又相互依赖的对立统一事物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Fang (2011)提出阴阳观的核心内容包含整体性、动态性和辩证性三大原理,并认为矛盾双方是相互协同、相辅相成的动态统一体。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正如太极图中的阴阳两面,它们在对立与互补的张力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共同影响创业拼凑。为了更好地实现“执两用中”,新创企业必须要考虑外部环境对不同决策逻辑发挥作用的影响,才能够清楚揭示两者的关系,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对两者进行协调和平衡。

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新创企业难以有效把握市场未来发展趋势,导致结果和预期目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此时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之间会更多呈现出“相生”的互补关系。阴阳观的整体性

原理指出,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就如决策逻辑的阴阳两面,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因而可以看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组合使用弥补了单独使用其中一种逻辑可能导致缺乏效率或灵活性的不足,一方是另一方的有利补充,两者结合带来的优势得到增强而弊端会减弱,表现出利大于弊。一方面,效果推理虽然有利于新创企业,在高不确定环境下加强对现有资源的特性进行准确分析,通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应对环境变化(Chandler et al, 2011; 郭润萍, 2016)。但是仅采用效果推理将会造成缺乏具体和一致的目标,不能为未来提供指导方向,从而会导致企业对现有资源进行拼凑的效率不高。此时,因果推理通过市场竞争分析和制定商业计划为新企业资源配置活动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Reymen et al, 2015; Fisher, 2012),进而有利于提升创业拼凑的效率。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新创企业可以使用因果推理作为效果推理的补充来应对当前目标不明确的问题。

另一方面,处于高不确定环境下的新创企业仅采用因果推理将花费大量时间在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上,导致新企业缺乏快速适应环境变化和识别新机会的组织柔性,从而容易受到意外事件的威胁(Sarasvathy, 2001)。此时,效果推理促使企业保持灵活性能够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充分利用偶然因素以创造价值,并通过快速调整自身运作流程以捕捉潜在机会,从而有助于对多样化资源进行拼凑(Reymen et al, 2015; Welter et al, 2016)。根据阴阳观的辩证性原理,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两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在高不确定环境下两者通过相互协同有利于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了对立统一的平衡(Fang, 2011),对创业拼凑的正向影响得到增强。高不确定环境对新创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而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组合使用则能从不同视角为企业搜集和处理信息,通过这些不同类型的信息和视角整合到决策过程中,有利于企业避免危险的极端情况并做出更加平衡的决策。可见,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组合使用反映了两者的互补效应,可以避免过度依赖单一逻辑所带来的能力缺陷,有助于新创企业增强资源的利用效率,对创业拼凑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 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具有积极影响。

1.2.2 低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的关系研究

低不确定环境表明技术更新速度较缓,市场需求变化较慢,新创企业可以较为容易地把握市场趋势和识别新的机会。可以看出,这种情境对新创企业来说是比较理想的,遵循效果推理的新企业在“干中学”的过程中通过渐进式资源投入以评估机会的风险,可以更好认识和理解不同资源组合的价值,从而有利于对闲置的或被废弃的资源进行创造性的利用(Perry et al, 2012)。

一方面,效果推理促使新创企业从自身能够承担的风险和损失范围内进行决策,通过逐步地资源投入避免了因过度冒险而造成较多的资源损失。遵循效果推理的新创企业会根据资源投入和产出反馈的关系来评估新机会的风险,注重依靠充分整合已有资源来不断调整创业行动,从而能够更好地配置关键资源来解决问题(郭润萍, 2016)。由于新创企业面临资源约束问题,效果推理促使新企业重视获取评估机会风险所需的隐性经验知识,有助于在拼凑的过程中能够从不可行的机会中及时退出(Sarasvathy, 2001; Dew et al, 2009),减少失败的成本,保证了后续进行创业拼凑的资源供应。

另一方面,效果推理促使新创企业保持组织灵

活性,从而能够预先采取行动以利用变化,有助于动态调整创业拼凑进程。遵循效果推理的新创企业会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自身流程和内部结构,有利于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最大价值,从而能够实现内部资源能力和环境的匹配(Welter et al, 2016)。效果推理促使新创企业密切关注市场发展动态,获得相关市场信息,对现有资源有着更高层次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实现物尽其用,从而可以更好地配置资源来解决问题。综上,在低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促进新创企业注重评估机会风险和灵活调整组织流程,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在低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对创业拼凑具有积极影响。

低不确定环境表明顾客需求和政策变化较慢,遵循因果推理的新创企业在进行创业拼凑时追求预期回报最大化,利用已有知识和经验来避免偶然因素,从而可以选择最优的资源组合以改善拼凑的质量(Perry et al, 2012)。采用因果推理的新创企业认为他们能够准确预测未来市场需求状况(Fisher, 2012),通过预先采取行动而有助于对现有资源的创造性利用。遵循因果推理的新创企业在对顾客需求变化进行预测的过程中会积极搜索市场或技术信息,可以更好识别市场上已有的机会(Chandler et al, 2011; Dutta et al, 2015),为创业拼凑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新创企业在搜索过程中追求预期回报最大化,将有助于增进新企业对现有资源价值的认知,从而促使企业通过制定有效的计划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低不确定环境下,因果推理促使新创企业通过对市场接受程度和销量进行精准地预测,以预期收益最大化标准来评估各种方案,促使企业注重优化资源组合,有助于新企业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解决问题。此外,因果推理促使新创企业利用已有知识来避免

意外事件发生,可以按照原有的预算与进度安排进行创业拼凑,从而有助于企业充分调配内部资源(Naveh, 2007)。在低不确定环境下,新创企业通过制定有效的战略计划以避免未知,使得对创新目标有着清晰的理解和认知,确保内部各子系统间能够相互协作,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在低不确定环境下,因果推理虽然促使新创企业通过追求预期回报最大化和避免未知提高了创业拼凑的效率,但是过度依赖因果推理也可能造成过多承担风险和路径锁定效应等不利影响。过强的因果推理使得新创企业追逐预期回报最大化而过度承担风险,将所有资源都投入到高风险项目,导致企业用于维持日常运营和识别机会的资源可能会严重不足(Pieterse et al, 2011)。由于新创企业存在着资源约束,过强的因果推理使得企业不对风险加以算计而容易掉入“勇于冒险的陷阱”,导致资源配置混乱(董保宝, 2014),不利于组织内部的运作与管理,也不利于企业开发新产品或服务。此外,过强的因果推理加剧了新创企业的路径依赖,容易产生锁定效应而使得企业行动僵化,不利于对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遵循因果推理的新创企业强调避免意外事件发生,不利于多样化知识的获取,从而无法准确识别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潜在机会与威胁。过强的因果推理促使新创企业根据已有的知识或经验进行创业拼凑时,可能会局限于过去的成功所产生的惯性思维,不利于创新想法的产生和实施,导致无法有效配置现有资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在低不确定环境下因果推理对创业拼凑具有倒U型影响。

在低不确定环境下,新创企业可以较为容易地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和竞争对手的行为,此时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之间会更多呈现出“相克”的替代关系。阴阳观的动态性指出矛盾双方都是依据不同条件而发生相应变化的(Fang, 2011),在低不确

定环境下,组合使用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所带来的优势会减弱而弊端会增强,表现出弊大于利。一方面,两种决策逻辑是在不同思维的基础上制定战略,可能导致矛盾的结果。效果推理强调以企业现有的资源作为决策依据并选择可以实现的目标,通过试错和迭代学习以实现对未来的控制;然而,因果推理则是以先前制定的目标为决策依据来选择最优的资源,强调通过信息分析和预测以追求预期回报最大化(Perry et al, 2012; Fisher, 2012)。在低不确定环境下,同时使用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新创企业面临着两套不同甚至是冲突的战略,将导致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从而在决策的选择上将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不利于企业对现有资源进行创造性使用。根据阴阳观的动态性原理,在低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之间存在的冲突将加剧升级,新创企业又受到资源和能力的束缚,若在进行创业拼凑时兼顾两种不同逻辑将会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另一方面,处于低不确定环境下的新创企业若组合使用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将会为组织有限资源而展开竞争并且难以调和。根据阴阳观的辩证性和动态性原理,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两者既统一又对立,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会向对方转化(Fang, 2011)。在低不确定环境下两者的出发点、核心逻辑和决策依据等方面的对立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在企业内部会出现资源张力与矛盾,容易造成资源分配失衡。而新创企业往往面临着资源匮乏的窘境,在人才、资金和经验等方面受到约束,导致无法有效应对不同决策逻辑之间存在着资源竞争的状况,这势必会影响到创业拼凑的效率。此外,新创企业注意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在低不确定环境下组合使用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将会分散注意力(Ocasio, 2011),可能导致效率低下和成本增加,不利于新企业进行创业拼凑。由于未来是可以预测的,遵循因果推理制

定的目标和计划在低不确定的环境中可以被定义得更清楚(Yu et al, 2018),新创企业只需要按照固定的计划进行资源配置,没有必要将时间及注意力分配到协调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间的矛盾上。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在低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具有消极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样本主要来自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新创企业。通过课题组成员社会网络联系新创企业、到创业孵化园进行调研等方式发放问卷共450份,实际回收362份,问卷填写均由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或创业团队成员完成。发放问卷时,向受访者说明调查目的,保证所填信息仅用于学术研究。在对问卷进行整理汇总后,剔除因填写不完整、成立年限超过10年的无效问卷34份,最终获得328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90.6%。本文研究对象是新创企业,从企业成立年限来看,大多数企业处在创建期和成长期,其中:成立年限在5年以内的占69.8%;从企业规模来看,样本主要集中为250人以下,其中员工人数在20人~50人的占32%;从行业类型来看,高科技和商贸服务类行业占到78.4%。

2.2 变量测量

(1) 效果推理。本研究效果推理的测量采用Brettel等(2012)开发的量表,可承担损失、利用权变和手段导向都包含5个题项,战略联盟包含4个题项,量表设计采用Likert 5点量表。效果推理的组合信度为0.851,表明具有较好的信度。问卷量表设计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

(2) 因果推理。采用Brettel等(2012)开发的量表,预期回报包含5个题项,竞争分析包含4个题项,避免意外和目标导向都包含6个题项。因果推理的组合信度为0.882,表明具有较好的信度。

(3) 创业拼凑。采用 Senyard 等(2009)设计的量表,包含 8 个题项。创业拼凑的 α 系数为 0.788。

(4) 环境不确定性。采用 Miller 和 Friesen (1982)设计的量表,包含 6 个题项。环境不确定性的 α 系数为 0.733。

(5) 控制变量。本文对创业者年龄、教育水平、成员经历、企业年龄、员工人数和行业特征等变量进行控制。

2.3 同源方差检验

为了避免同源方差问题,我们采取匿名调查、问卷题项以模块形式分开的方法,并利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的方法进行检验。通过对所有题项进行主成份分析,结果显示提取到未经旋转的第一个公因子解释方差为 21.756%,并没有出现单个因子解释多数方差的现象,可以判定本研究同源方差问题不明显。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效果推理、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系数远小于 AVE 值的平方根,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3.2 回归分析

根据环境不确定性的平均值将样本分为两部分,即高不确定环境样本组(163 份)和低不确定环境样本组(165 份),并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之所以选择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主要是因为这种方法可以更为直观地检验在不同环境下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强度和方向。具体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2 所示。

首先,分析高不确定环境的样本数据,从模型 2 可以看出,效果推理($\beta=0.328$, $p<0.01$)和因果推理($\beta=0.216$, $p<0.05$)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模型 3 可以看出效果推理的平方($\beta=-0.030$, $p>0.05$)对创业拼凑没有显著影响,假设 H1 得到支持。从模型 3 可以看出,因果推理的平方($\beta=0.251$, $p<0.05$)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在高不确定环境下,因果推理和资源拼凑之间呈现 U 型曲线关系,假设 H2 得到支持。从模型 4 可以看出,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交互项($\beta=0.230$, $p<0.01$)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3 得到支持。

接下来分析低不确定环境的样本数据,从模型 6 可以看出,效果推理($\beta=0.398$, $p<0.01$)和因果推理($\beta=0.338$, $p<0.01$)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模型 7 可以看出效果推理的平方($\beta=0.083$, $p>0.05$)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不显著,假设 H4 得到验证。从模型 7 可以看出,因果推理的平方($\beta=-0.323$, $p<0.01$)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低不确定环境下,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假设 H5 得到验证。从模型 8 可以看出,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交互项($\beta=-0.227$, $p<0.01$)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假设 H6 得到验证。

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加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本研究在全部样本中进行回归分析,对环境不确定性在效果推理、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 效果推理	4.03	0.39	0.768			
2. 因果推理	3.98	0.47	0.676**	0.808		
3. 环境不确定性	3.62	0.58	0.170**	0.118*	0.657	
4. 创业拼凑	4.14	0.46	0.583**	0.520**	0.116*	0.638

注:n=328;*表示 $p<0.05$,**表示 $p<0.01$;对角线数据为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值,下同

表2 回归分析结果(1)

变量		创业拼凑							
		高不确定性环境				低不确定性环境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控制变量	年龄	-0.166	-0.142	-0.138	-0.141	0.067	-0.097	-0.125	-0.090
	教育水平	0.199	0.131	0.124	0.152	0.053	-0.010	-0.006	-0.039
	成员经历	0.193	-0.006	0.022	0.026	0.029	0.026	0.018	0.020
	企业年龄	0.181	0.079	0.051	0.027	0.010	0.092	0.054	0.059
	员工人数	0.173	0.243	0.213	0.220	0.179	0.026	0.077	0.085
	高科技	0.263	0.140	0.119	0.057	0.009	-0.048	0.029	-0.058
	传统制造	0.061	-0.047	-0.042	-0.068	-0.189	-0.179	-0.104	-0.186
	建筑房产	-0.227	-0.215	-0.215	-0.204	-0.017	0.043	0.068	0.028
	商贸服务	0.116	-0.037	-0.026	-0.049	-0.150	-0.135	-0.056	-0.167
自变量	效果推理		0.328**	0.250**	0.277**		0.398**	0.406**	0.319**
	因果推理		0.216*	0.413**	0.323**		0.338**	0.219*	0.291**
	效果推理 ²			-0.030				0.083	
	因果推理 ²			0.251*				-0.323**	
	效果×因果				0.230**				-0.227**
R^2		0.276	0.449	0.472	0.479	0.079	0.504	0.569	0.540
F 值		6.434	11.131	10.159	11.425	1.485	14.116	15.305	14.861
ΔR^2		0.276	0.174	0.022	0.030	0.079	0.424	0.065	0.036

表3 回归分析结果(2)

变量		创业拼凑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控制变量	年龄	-0.049	-0.109	-0.112	-0.073	-0.105	-0.109	-0.109	-0.099
	教育水平	0.089	-0.003	0.000	0.065	0.061	0.027	0.023	0.037
	成员经历	0.102	0.011	0.016	0.009	0.030	-0.018	-0.020	0.003
	企业年龄	0.093	0.058	0.057	0.061	0.053	0.063	0.066	0.033
	员工人数	0.209	0.179	0.178	0.135	0.143	0.165	0.171	0.160
	高科技	0.005	-0.086	-0.094	0.003	0.033	-0.047	-0.045	-0.078
	传统制造	-0.141	-0.211	-0.215	-0.156	-0.130	-0.195	-0.197	-0.200
	建筑房产	-0.113	0.084	-0.082	-0.075	-0.082	-0.072	-0.074	-0.065
	商贸服务	-0.129	-0.233	-0.237	-0.121	-0.086	-0.192	-0.197	-0.200
自变量	效果推理		0.532**	0.528**			0.397**	0.397**	0.327**
	因果推理				0.627**	0.640**	0.242**	0.227**	0.302**
	效果推理 ²		-0.086	-0.074					
	因果推理 ²				0.211**	0.030			
	效果×因果							-0.034	-0.012
调节变量	环境不确定			-0.018		-0.137*			-0.149**
	环境×效果			-0.024					
	环境×因果					0.027			
	环境×效果 ²			0.029					
	环境×因果 ²					0.316**			
R^2		0.122	0.413	0.415	0.381	0.448	0.436	0.437	0.490
F 值		4.904	20.250	15.838	17.621	19.579	22.123	20.284	21.377
ΔR^2		0.122	0.291	0.292	0.259	0.013	0.314	0.001	0.053

从模型 10 可以看出,效果推理($\beta=0.532$, $p<0.01$)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效果推理平方($\beta=-0.086$, $p>0.1$)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在模型 11 中,环境不确定性与效果推理的乘积项对创业拼凑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对效果推理与创业拼凑的关系并不具有调节作用,假设 H1 和假设 H4 再次得到验证。

在模型 12 中,因果推理平方($\beta=0.211$, $p<0.01$)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因果推理对创业拼凑具有 U 型影响。在模型 13 中,环境不确定性与因果推理平方的乘积项($\beta=0.316$, $p<0.01$)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影响,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对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图 2 可以看出,当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呈 U 型关系,而当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呈倒 U 型关系,假设 H2 和假设 H5 再次得到验证。

在模型 15 中,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交互作用($\beta=-0.034$, $p>0.1$)对创业拼凑影响不显著。但是在模型 16 中,两者的交互作用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乘积项($\beta=0.285$, $p<0.01$)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环境不确定性对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交互作用与创业拼凑的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

作用。从图 3 可以看出,当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交互作用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拼凑,而当环境不确定性低时,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具有负向影响,假设 H3 和假设 H6 再次得到验证。总的来看,通过在全部样本中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假设再次得到验证,说明本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稳健性。

另外,为了检验文章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行业情境的作用机制,选择以是否处于高科技行业为调节变量,其中全部样本内共有 120 份为高科技行业,208 份为非高科技行业。相比于非高科技行业中的企业,高科技行业中的新创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意味着环境不确定程度较高。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模型 19 可以看出,高科技行业与效果推理的乘积项对创业拼凑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表明高科技行业对效果推理与创业拼凑的关系并不具有调节作用。在模型 21 中,高科技行业与因果推理平方的乘积项($\beta=0.814$, $p<0.01$)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影响,表明高科技对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图 4 可以看出,当新创企业处于高科技行业时,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呈 U 型关系,而当新创企业处于非高科技行业时,因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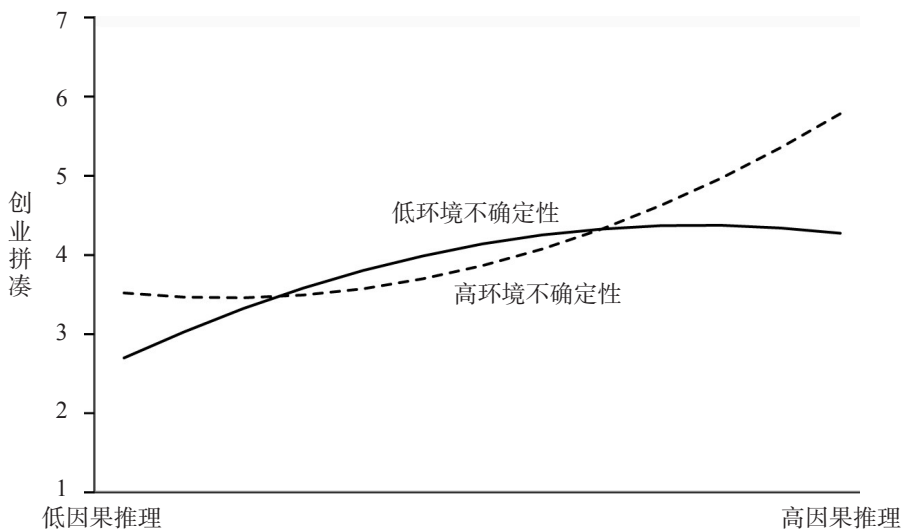


图2 环境不确定性对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关系的调节作用

推理与创业拼凑呈倒U型关系。

在模型24中,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交互作用与高科技行业的乘积项($\beta=0.126, p<0.05$)对创业拼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高科技行业对两者交互作用与创业拼凑的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从图5可以看出,当新创企业处于非高科技行业时,两者的交互作用显著负向影响创业拼凑。总的来看,说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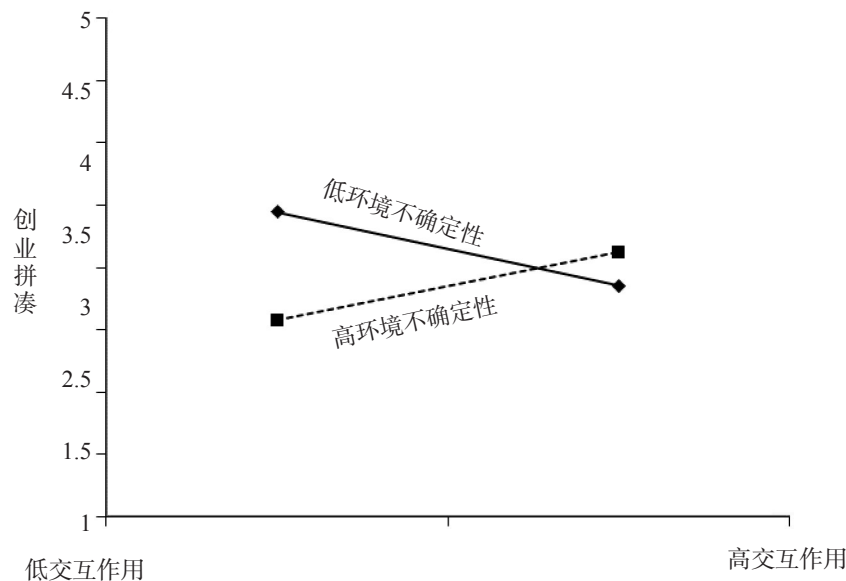


图3 环境不确定性对交互作用与创业拼凑关系的调节作用

表4 回归分析结果(3)

变量		创业拼凑							
		模型 17	模型 18	模型 19	模型 20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23	模型 24
控制变量	年龄	-0.069	-0.135	-0.110	-0.101	-0.022	-0.134	-0.134	-0.102
	教育水平	0.103	0.028	0.005	0.089	0.095	0.053	0.053	0.028
	成员经历	0.093	0.014	0.013	0.016	-0.002	-0.014	-0.014	-0.020
	企业年龄	0.089	0.070	0.055	0.069	0.018	0.075	0.075	0.064
	员工人数	0.206	0.162	0.165	0.112	0.105	0.148	0.148	0.157
	环境不确定	0.076	-0.004	-0.004	-0.018	-0.003	-0.004	-0.004	-0.018
自变量	效果推理		0.539**	0.527**			0.409**	0.409**	0.355**
	因果推理				0.644**	0.588**	0.225**	0.226**	0.264**
	效果推理 ²		-0.064	-0.083					
	因果推理 ²				0.248**	-0.446**			
	效果×因果							0.001	-0.081
调节变量	高科技行业			0.172**		-0.036			0.108*
	高科技×效果			0.019					
	高科技×因果					0.067			
	高科技×效果 ²			-0.027					
	高科技×因果 ²					0.814**			
	高科技×交互								0.126*
R ²		0.099	0.386	0.410	0.357	0.493	0.408	0.408	0.440
F值		5.884	25.118	19.981	22.037	27.837	27.386	24.267	22.539
ΔR ²		0.099	0.287	0.024	0.257	0.136	0.309	0.000	0.033

此外,本文按照 Haans 等(2015)对 U 型关系调节作用的检验方法,将 U 型关系的调节分为:(1) 曲线拐点向左或向右发生偏移;(2) 使得曲线变陡或者变缓,即曲线斜率的绝对值增大或者减小。

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对第一种调节作用进行检验:求回归方程 $Y=\beta_0+\beta_1X+\beta_2X^2+\beta_3XZ+\beta_4X^2Z+\beta_5Z$ (Z 为调节变量)对 X 的一阶导数并使它等于零,可以得到拐点为: $X^*=(-\beta_1-\beta_3Z)/(2\beta_2+2\beta_4Z)$ 。此时拐点位置取决于调节变量 Z 的值,因此上式对 Z 求导, $\partial X^*/\partial Z = (\beta_1\beta_4 - \beta_2\beta_3) / (\beta_2 + \beta_4Z)^2$ 。根据表 3 模型 15 可知,,因此当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时候,拐点

会向右发生偏移,第一种调节作用得到验证。

对第二种调节作用进行检验: $Y=\beta_0+\beta_1X+\beta_2X^2+\beta_3XZ+\beta_4X^2Z+\beta_5Z$,只需要检验 β_4 是否显著。根据表 3 模型 15 可知, $\beta_4=0.316$,且 $p<0.01$,因此当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时,U 型曲线会变陡,斜率绝对值增大,第二种调节作用得到验证。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基于阴阳观和效果推理理论,本研究以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在不同环境情境下效果推理、因果推理和两者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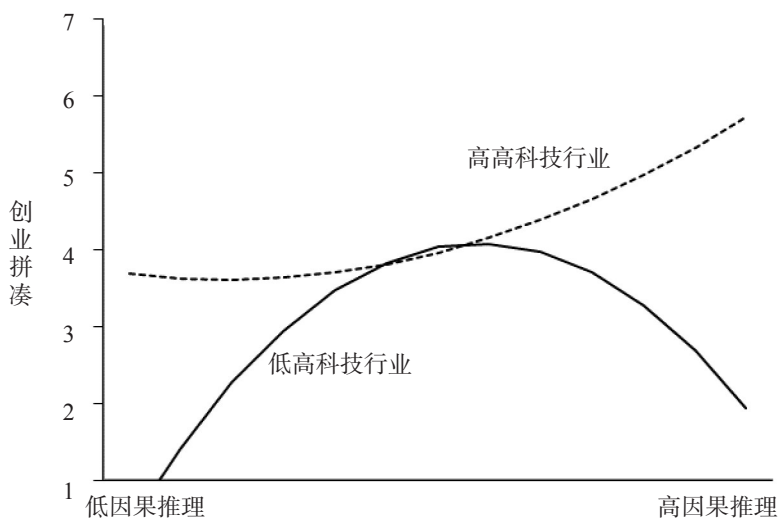


图4 高科技行业对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关系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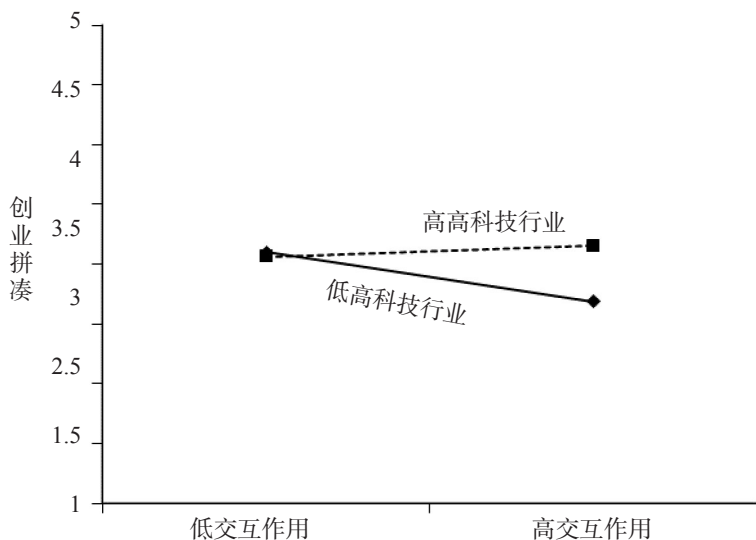


图5 高科技行业对交互作用与创业拼凑关系的调节作用

机理。基于328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无论环境不确定性是高还是低，效果推理对创业拼凑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因果推理在不同环境下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在高不确定环境下因果推理对创业拼凑具有U型影响，而在低不确定环境下因果推理对创业拼凑则具有倒U型影响。(3)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低不确定环境下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则具有消极影响。研究结论揭示了双元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差异，以及与不同外部环境的匹配效应。

4.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首先，通过探讨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对创业拼凑的作用关系，发现这两种决策逻辑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因果推理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影响，从而突破了以往研究将影响关系局限于“正向还是负向”的有限认识。该结论验证了Sarasvathy(2001)和崔连广等(2017)的观点，即效果推理所代表的非预测逻辑在高不确定和资源约束情境下作用明显。本研究发现在稳定的环境下效果推理对创业拼凑同样行之有效，是对他们观点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同时该结论与Yu等(2018)的研究不一致，他们发现在低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对企业绩效并不具有促进作用。之所以产生相悖的观点，一个主要原因在于Yu等(2018)的研究对象为成熟企业，研究结果的差别也印证了新创企业所具有的特殊性，新创企业大多数面临着资源约束的困境。已有实证研究较多地关注了效果推理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彭学兵等, 2017; Smolka et al, 2018)，而对其他变量因素关注较少。正如Perry等(2012)在研究中所呼吁的那样，以效果推理对其他构念影响为主题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推动效果推理理论向前发展。本文引入效果推理理论为分析新企业创业拼凑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较好地

回答了“拼凑究竟是如何发生”这一重要问题，对效果推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本研究基于“阴阳观”视角探究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将中国传统的阴阳观思想运用到管理学领域的决策逻辑方面，这有助于深化和拓展效果推理理论研究。现有关于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双元关系的研究存在较大争议，如Brettel等(2012)认为他们是两种完全对立、相互排斥的决策逻辑，而Reymen等(2015)和Smolka等(2018)研究指出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具有互补效应。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在高不确定环境下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具有互补效应，而在低不确定环境下则具有替代效应。本研究从阴阳观视角对这两种决策逻辑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为阴阳观的观点提供了实证的支持，突破了以往研究仅仅单独分析效果推理与因果推理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不足，扩大了阴阳观思想的应用范围。通过揭示在不同环境下两种决策逻辑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影响的差异，证明了组织双元性并不总是有益的，在稳定环境下新创企业由于受到严峻资源约束会面临双元决策逻辑的张力与冲突，对创业拼凑产生抑制作用，该结论有助于丰富组织双元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再次，将效果推理理论和创业拼凑整合到一个框架下，加深了对创业拼凑形成机制的理解，有助于推动创业拼凑研究的发展。现有文献较多地关注创业拼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权变因素，而对创业拼凑的前因变量关注较少，如祝振铎等(2017)验证了关系信任在创业拼凑与新企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刘人怀等(2017)探讨了创业导向对创业拼凑与创业学习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验证了两种不同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的差异化影响，并从阴阳观这一全新的视角进行解读，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资源拼凑驱动因素的研究。已有研

究较多地将创业拼凑当作是组织的即兴行为 (Baker et al, 2005; 祝振铎等, 2017), 而忽略了对拼凑行为所蕴含的理性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决策逻辑视角探究创业拼凑行为是如何发生的问题, 验证了孙永磊等(2018)的观点, 即企业会根据新的战略来挑选和组合已有资源, 是管理者有意识的行为。本文响应了 Senyard 等(2014)的呼吁, 跳出将创业拼凑局限于组织即兴的边界, 分析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两种不同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的影响, 进一步丰富了创业拼凑理论的相关研究。研究表明创业拼凑并非全部都是临时起意的即兴行为, 也可以是经过预先规划的行动, 这是对创业拼凑应用范围的重要扩展, 促进了对创业拼凑诱发机制的理解。

最后, 探讨了二元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影响的边界条件, 以环境不确定性为突破口, 分析在不同环境下效果推理、因果推理及交互作用对创业拼凑的差异影响, 深化了对创业拼凑促进机理的研究。尽管 Smolka 等(2018)揭示了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的交互作用对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但是并没有对这种影响的边界条件进行深入探究。本文发现只有当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 两者的交互作用才会对创业拼凑产生促进作用, 而当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则会产生抑制作用, 厘清了对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这也进一步说明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作为阴阳两面既对立又统一, 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 表现为“相生相克”的关系。该结论验证了 Fisher(2012)的观点, 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在不同条件下呈现出相互冲突或者是互补的关系。本研究通过揭示影响的边界条件, 为两种不同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的作用发挥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解释, 丰富了对效果推理的权变作用机理研究。

本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首先, 新创企业应该认识到灵活转变不同决策逻辑的重要

性。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对促进创业拼凑具有不同的作用, 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扬长避短地选择合适的决策逻辑。效果推理有助于新创企业加强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以获得知识和信息, 通过识别和利用新机会以更好的配置资源解决问题。在低不确定环境下, 新创企业应根据自身资源与能力状况, 在运用因果推理进行创业拼凑时应遵循适度原则, 避免“过犹不及”。其次, 新创企业也应认识到同时运用多种决策逻辑的能力的重要性, 在进行创业拼凑时注重把握效果推理和因果推理两者之间相生相克关系。新企业应根据内部资源能力状况和外部环境变化, 对两者进行权衡选择和动态调整, 既可以有效缓解两者争夺资源的冲突, 又可以充分发挥两者的协同互补作用。这也对新创企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因此新创企业要培养整体性思维、动态思维和辩证思维, 才能够利用现有资源解决当前问题, 促进企业长期发展。

4.3 研究展望

首先, 本文仅讨论了在不同环境下效果推理、因果推理对创业拼凑的差异影响, 后续研究可以从其他视角发掘关键的传导机制, 例如探究社会网络关系、战略导向的中介作用, 以揭示不同决策逻辑对创业拼凑的作用机理。其次, 本文未区分创业拼凑的不同模式, 如从拼凑频率和范围的角度可以分为平行拼凑和选择性拼凑, 未来研究可以结合中国转型市场特点, 着手于开发这两种不同模式的测量量表, 有助于更深入地探索平行拼凑和选择性拼凑对新创企业成长的作用差异。再次, 创业者特质不仅决定着创业者人力资本质量的高低, 而且通过战略决策的制定以及企业行为进而影响新创企业绩效, 未来研究可以探究创业者心理特征(如风险偏好、过度自信和自恋等)对决策逻辑及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最后, 本文依据所收集的截面数据, 采用回归分析这一定量研究方法, 后续研究可以采用长期跟踪的纵向案例

研究方法或定性比较分析法,以提高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准确性。QCA是一种介于定性和定量之间的方法,可以从更加系统的视角深入详细地解释创业拼凑。

参考文献

- 崔连广,张敬伟,邢金刚. 2017. 不确定环境下的管理决策研究:效果推理视角[J]. 南开管理评论,20(5):105-115.
- 董保宝. 2014. 风险需要平衡吗:新企业风险承担与绩效倒U型关系及创业能力的中介作用[J]. 管理世界,(1):120-131.
- 杜运周,张玉利,任兵. 2012. 展现还是隐藏竞争优势:新企业竞争者导向与绩效U型关系及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J]. 管理世界,(7):96-107.
- 郭润萍. 2016. 手段导向、知识获取与新企业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J]. 管理科学,29(3):13-23.
- 刘人怀,王娅男. 2017. 创业拼凑对创业学习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导向的调节作用[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38(10):135-146.
- 彭学兵,王乐,刘玥伶,等. 2017. 创业网络、效果推理型创业资源整合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38(6):157-170.
- 孙永磊,陈劲,宋晶. 2018. 双元战略导向对企业资源拼凑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研究,36(4):684-690.
- 杨俊,张玉利,刘依冉. 2015. 创业认知研究综述与开展中国情境化研究的建议[J]. 管理世界,(9):158-169.
- 祝振铎,李非. 2017. 创业拼凑、关系信任与新企业绩效实证研究[J]. 科研管理,38(7):108-116.
- 于晓宇,李雅洁,陶向明. 2017. 创业拼凑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J]. 管理学报,14(2):306-316.
- Baker T, Nelson R E. 2005.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50(3):329-366.
- Barney J. 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17(1):99-120.
- Brettel M, Mauer R, Engelen A, et al. 2012. Corporate effectuation: Entrepreneurial action and its impact on R&D project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7(2):167-184.
- Chandler G N, Detienne D R, Mckelvie A, et al. 2011.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processes: A validation stud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6(3):375-390.
- Dew N, Sarasathy S, Read S, et al. 2009. Affordable loss: Behavioral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plunge decision[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3(2):105-126.
- Dutta D K, Gwebu K L, Wang J. 2015.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in technology, relate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in emerging technology industries: A process of causation or effectuation?[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11(3):529-555.
- Fang T. 2011. Ying Yang: A new perspective on culture[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8(1):25-50.
- Fisher G. 2012. Effectuation, causation, and bricolage: A behavioral comparison of emerging theories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36(5):1019-1051.
- Haans R F J, Pieters C, He Z L. 2015. Thinking about U: Theorizing and test U- and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in strategy research[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37(7):1177-1195.
- Hadida A L, Tarvainen W, Rose J. 2015.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A consolidating review and framewo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17(4):437-459.
- Lavie D, Stettner U, Tushman M L. 2010.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within and across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4(1):109-155.
- Lueg R, Borisov B G. 2014. Archival or perceived 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Conceptualization and new em-

- pirical evidence[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32(4):658-671.
- March J G. 1991.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2(1):71-87.
- Miller D, Friesen P H. 1982. Innovation in conser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firms: Two models of strategic momentu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3(1):1-25.
- Naveh E. 2007. Formality and discretion in successful R&D projects[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5(1):110-125.
- Ocasio W. 2011. Attention to atten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22(5):1286-1296.
- O'Reilly C A, Tushman M L. 2013.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7(4):323-338.
- Perry J T, Chandler G N, Marnova G. 2012. Entrepreneurial effectuation: A review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36(4):837-861.
- Pieterse D, Knippenberg W, Ginkel E. 2011. Diversity in goal orientation, team reflexivity, and team performance[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14(2):153-164.
- Reymen I M M J, Andries P, Berends H, et al. 2015. Understanding dynamics of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in venture creation: A process study of effectuation and causation[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9(4):351-379.
- Richard O C, Murthi B P S, Ismail K. 2007. The impact of racial diversity on intermediate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contex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8(12):1213-1233.
- Sarasvathy S D. 2001.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Toward a theoretical shift from economic inevitabil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ntingen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6(2):243-263.
- Sarasvathy S, Kumar K, York J G, et al. 2014. An effectu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Overlaps, challenges, and provocative possibilitie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38(1):71-93.
- Senyard J M, Baker T, Davidsson P. 2009.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Towards systematic empirical testing[J].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29(5):1-15.
- Senyard J, Baker T, Steffens P, et al. 2014. Bricolage as a path to innovativeness for resource-constrained new firm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31(2):211-230.
- Smolka K M, Verheul I, Burmeister-Lamp K, et al. 2018. Get it together! Synergistic effects of causal and effectual decision-making logics on venture performanc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42(4):571-604.
- Welter C, Mauer R, Wuebker R J. 2016. Bridging behavioral models and theoretical concepts: Effectuation and bricolage in the opportunity creation framework[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10(1):5-20.
- Yu X, Tao Y, Tao X, et al. 2018. Managing uncertainty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35(C):121-131.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ffectuation, Caus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texts: Based on the View of Yin-Yang

WANG Le, LONG Jing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s crucial in the process of new venture breaking through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gaining growth. However, how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happens is not answered clearly. Based on the view of yin-ya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 in impact of effectuation, caus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328 questionnaires of new venture, it is found that: (1) Whether the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is high or low, effectuation has a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2) Causation has an U-shaped influence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n the highly uncertain environment, however, causation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n the low uncertainty environment; (3) The interaction of effectuation and caus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n a highly uncertain environment, however, their interac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n a low uncertainty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reveals the difference in impact of decision logic duality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which provides useful guidance for new ventures to solve resource constraints.

Key words: effectuation; causati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yin-yang